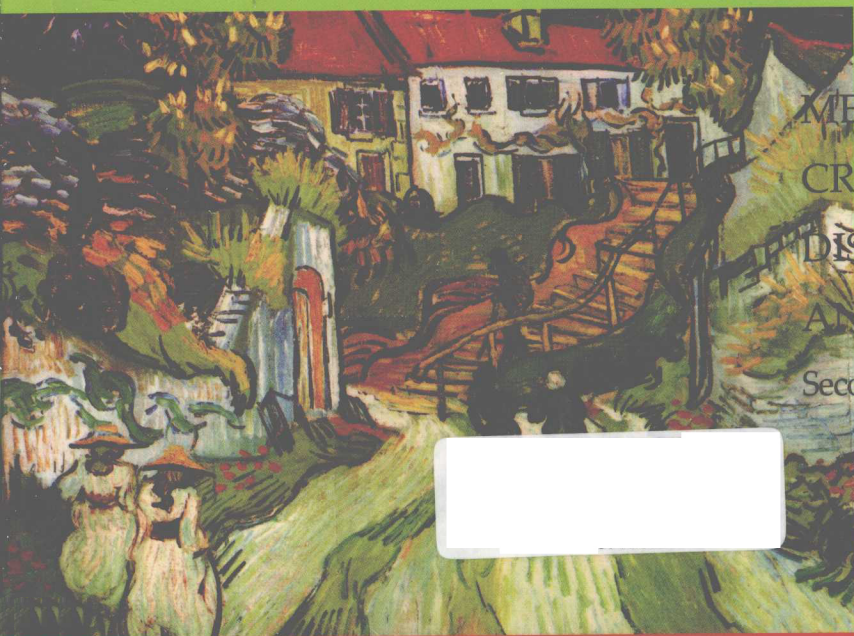




西方语言学前沿丛书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第二版)

中文导读注释版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英] 露丝·沃达克 (Ruth Wodak)
[英] 迈克尔·迈耶 (Michael Meyer) 主编

李战子◎导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第二版)

(中文导读注释版)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英) 露丝·沃达克 (Ruth Wodak)

主编

(英) 迈克尔·迈耶 (Michael Mey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62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2版. 中文导读注释版: 英文/(英) 沃达克 (Wodak, R.), (英) 迈耶 (Meyer, M.) 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0
(西方语言学前沿丛书)
ISBN 978-7-301-24805-8

I. ①批… II. ①沃… ②迈… III. ①话语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693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Ruth Wodak and Michael Meyer 2009

书 名: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第二版)(中文导读注释版)

著作责任者: (英) 露丝·沃达克 (Ruth Wodak)

(英) 迈克尔·迈耶 (Michael Meyer) 主编

责任编辑: 刘文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805-8/H · 357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liuwenjing008@163.com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4.5印张 300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专家委员会

陈新仁	程晓堂	丁建新	丁言仁
封宗信	高一虹	顾曰国	胡壮麟
黄国文	姜望琪	李 兵	李福印
李战子	廖美珍	刘世生	卢 植
马秋武	毛浩然	苗兴伟	彭宣维
齐振海	钱 军	冉永平	申 丹
史宝辉	田贵森	王初明	王克非
王立非	王 寅	王振华	文 军
文 旭	熊学亮	杨永林	张德禄
张 辉	张绍杰	张应林	赵蓉晖

总 序

马年甫始，喜讯频传。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12年起着手准备影印出版“西方语言学前沿丛书”，经过国内专家多方推荐和认真论证，并与国外出版社谈判版权，已取得很大进展，最近将陆续出版。就我所知悉的内容，这套丛书的选题涉及句法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隐喻学、话语分析、文体学、多模态语言学等。“丛书”的出版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我国外语教育界近年来不时受到种种骚扰，最典型的、危害最大的论调是有人不把高校的外语教育看作一个专业，以致我国高校的外语专业学生除了学习听、说、读、写四个技能外，被要求到外系学习专业课；也有人不能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开放后在外语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图进取，走新中国成立前老路的片面观点。在此关键时刻，“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外语教育界的决策者和高校老师树立正确的全面的认识。

就深远意义而言，北京大学出版社继2011年出版“语言学论丛”系列论著外，再接再厉，如今又出版“西方语言学前沿丛书”，其用意无非是让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了解国际上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动向和进展。我认为此举还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就我国治学情况说，这将有利于扭转我国学术研究中不重视理论研究的陋习，如改革开放前我国外语界主要为编纂词典和教材；其次，这将帮助我们了解国外不同学派的出现和争鸣以推动学术创新；不仅如此，这也帮助我们了解国外学者如何注意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对理论不断修正。应该说，我们对实践还是一贯重视的，但对于如何以先进理论指导实践的认识有待提高。

这里，我还想就“西方语言学前沿丛书”的“前沿”二字谈一些看法。“前沿”的一层意思指“处于领先地位的”。我们平时常说要将我国外语教学和科研达到国际水平，就是要达到国际上的前沿水平。在这一点上，我们已取得很大进步。读者会发现本次出版的上下两集的 *LANGAUGE AND STYLE* 的论文集中，就收录了我国北京大学学者申丹教授的论文，这表明我国已有

学者达到“前沿”水平，与国外学者平起平坐了。我相信这一趋势将日益明显。

“前沿”的另一层意思是“前部的边儿”，它隐含的意义是一个学科或一门专业必然与其他学科或专业有这样那样的相邻关系，从其他学科和专业获得营养，拓宽视野。这是反映学术发展的交叉学科得以出现的前提。因此本语言学丛书既有传统意义的句法学、词汇学、语音学等选题，也有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文体学、隐喻学等选题，特别是与现代信息技术密切结合的多模态语言学。这便为我国学者指引了努力方向。

本套丛书采取英文原版影印，同时配有中文导读，并对目录主题等主要段落进行中文翻译的方式，以促进高校教师与学生更充分地汲取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成果。这体现了“丛书”策划者和编者能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的敬业精神。

最后，我对各书导读作者的学术水平和辛勤劳动非常钦佩，导读作者们不仅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各书的内容和要点，而且能够勇于对一些问题或观点发表评论，引导读者批判学习，殊非易事。可见，“前沿”的丛书需要“前沿”的导读执笔者、“前沿”的编者，谨向各位“者”们致敬！

胡壮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4年3月

导 读

由 Ruth Wodak 和 Michael Meyer 合编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第二版)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以下简称 CDA)的几种视角和方法,各章作者中有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凡·戴克(van Dijk)、凡·李悟文(van Leeuwen)等中国研究者熟悉的著名学者,全书共分七章清晰地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CDA)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的异同。各流派特点鲜明又相互依存,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语言和社会架构之间的关系。以下是各章的一些提要。

Ruth Wodak 和 Michael Meyer 撰写的《批评话语分析:历史、议程、理论和方法论》一文,作为开篇章节向读者展示了批评话语如何起源入手,陈述了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并讨论了 CDA 所面临的新挑战。随即,该文还从社会学和认识论的角度讨论了本书涉及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论,并导入批评话语分析家最为关注的三个基本概念:权力(power)、意识形态(ideology)和批评(critique),总结出一些重要原则。另外, Ruth Wodak 和 Michael Meyer 也指出 CDA 近些年来所面临的一些重要批评(参看 Billig 2003, 2008; Chilton 2007; Chilton & Wodak 2007; Wodak & de Cillia 2006)。

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以下简称 CL)和批评话语分析(CDA)这两个术语以前经常交叉使用。而批评话语分析(CDA)越来越受青睐,逐渐替代了批评语言学(CL)。本书中使用的就是批评话语分析(CDA)这一术语。CDA 有着众多的理论根源:修辞学、语篇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文学研究、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以及语用学。Teun van Dijk 等也使用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以下简称 CDS)这一术语。CDS/CDA 本质上采用的是以“问题为取向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Wodak & Meyer 2009),CDA 关注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它进行跨学科的、多种方法的研究。人们通常会认为 CDA 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负面”的或者异常“严重”的社会、政治事件,其实不然,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可以进行批评性研究。

Wodak 和 Meyer 还强调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两个概念：“文本”（text）和“话语”（discourse）。Michel Foucault¹, Jürgen Habermas², Chantal Mouffe³, Ernesto Laclau⁴, Niklas Luhmann⁵ 等学者在其论文中均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因此，话语（discourse）可以指一个历史纪念碑、一个“记忆所系之处”⁶、一个政治策略，也可以指狭义和广义的叙述、文本、演讲、主题相关的对话、语言等。与此同时，作者们还发现有种族话语、性别话语、关于“失业或就业”的话语、媒体话语、大众话语、历史话语等等。话语的意义已从一种语类（genre）延伸到一个文体（style）。这势必就会造成概念混淆而遭致批评和误解（Blommaert 2005; Reisigl 2007; Wodak 2008; Wodak & de Cillia 2006）。因此，该书每篇文章的作者在各自 CDA 具体研究方法中都对术语（discourse）做了相关定义。

Wodak 和 Meyer 在第二部分，给读者简短地介绍了“CDA 团体的形成发展史”。CDA 作为一个学者网络（network of scholars）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问世。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它有如下几个特点：1、CDA 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问题取向”的，因此有跨学科的特征；2、CDA 共同的兴趣是通过对语料（书面的、口语的或者是视觉的）进行系统研究以揭开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神秘面纱；3、CDA 研究者们也尝试着，在保留各自的科学方法论和对自己的研究过程进行反思的同时，清晰地阐释自己的立场和兴趣。van Dijk 1990 年创办期刊《话语和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Fairclough 1989/1991 年出版《语言和权力》（*Language and Power*）、Wodak 1989 年出版《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van Dijk 1984 年出版《话语中的偏见》（*Prejudice in Discourse*），它们共同标志着 CDA 的兴起。目

1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影响。

2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做“当代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 尚塔尔·墨菲（1943—），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目前就职于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大学，是该校政治国际关系系教授，指导民主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的工作。其知名著作是与厄尼斯特·拉克劳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促进了“话语分析艾塞克斯流派”（Exeter School of discourse analysis）的发展。文中首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她编辑并参加撰写了《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表过多篇关于当代政治思想、新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理论的文章。

4 厄尼斯特·拉克劳（1935—）阿根廷政治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艾塞克斯大学教授。他因与尚塔尔·墨菲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而受到普遍关注。

5 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德国当代重要的社会学家。卢曼作为社会系统理论的创新者，被视为卓越的社会学大家。卢曼与哈贝马斯对于社会系统理论的辩论非常著名。如同美国的社会系统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卢曼也主张用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负责的社会现象。

6 *lieu de mémoire*，该词为法国史学家皮耶·诺哈（Pierre Nora）所创，他将之定义为：一种物质或非物质实体，经由人类或时间转变，而成为一个社群的象征性遗产。就我们当代人而言，埃菲尔铁塔、马赛曲、普鲁斯特就是这样的“记忆所系之处”。但是，皮耶·诺哈不是要再次强调这些观光景点的美好，而是要藉由这些令人魂牵梦萦的所在，追溯其历史，传达背后那丰富眩目的多线故事、如何在历史与记忆的纠缠过程中尘埃落定成为现在的模样，成为人们朗朗上口的典故。

前,在诸多期刊杂志中,有《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语言和政治杂志》(*Th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话语、交流和视觉符号》(*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and Visual Semiotics*);也有能发表批评研究的电子杂志,如《跨学科话语分析之批评方法》(*Critical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Analysis Across Disciplines*)。系列书籍的编撰已启动(如《政治的话语途径》(*Discourse Approaches to Politics*)、《文化和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等)。

在“基本概念:话语、批评、权力和意识形态”部分,Wodak和Meyer强调:CDA不是只有一种具体的理论或研究方法。相反,CDA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收集的数据以及采用的方法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于,关于“话语”、“批评”、“意识形态”和“权力”等概念的定义都是不同的。因此,任何对CDA的批评首先应该明确其批评的是哪个研究者进行的哪项研究。

关于“话语”(The notion of discourse)这个概念,Wodak和Meyer引用了CDA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的一个定义:CDA把话语——口语和书面语中的语言使用——定义为一种社会活动形式。把话语定义为社会活动意味着在一个特别的话语事件和形成该话语事件的具体情形、局势、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话语事件由它们建构而成,也反过来重塑它们。这就是说,话语建构了知识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社会身份和关系。它既维持和再生了社会现状,又改造了现实。(Fairclough & Wodak 1997)。

Wodak和Meyer在“批评推动力”(The critical impetus)部分介绍,CDA强调“批评性”(critical)。该术语出现在某些“批评语言学家”的著作里,可追根溯源到法兰克福流派和哈贝马斯的影响(Anthonissen 2001; Fay 1987; Thompson 1988):法兰克福流派提出的“批评理论”主要基于Max Horkheimer¹1937年的那篇著名文章,他指出社会理论应当不同于倾向于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传统理论,应该有批评和改变社会的导向。理解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是:1、批评理论就其历史特指性来说应当直指社会总体;2、批评理论应当结合所有主要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政治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来提升对社会的理解。和批评理论一样,CDA强调:为了更好更恰当地理解语言在组成和传递知识过程中的作用,在组织社会机构和行使权力时的功能,有必要进行学科间的研究(参看Graham 2002; Lemke 2002; Martin & Wodak 2003)。在任何情形下,CDA的研究者们都必须意识

1 麦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1937年撰写发表的文章是《传统理论和批评理论》(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到:他们的研究跟其他学术工作一样,都是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目的的,他们没有任何特权。

意识形态指的是连贯的、相对稳定的一套信仰或价值观。尽管意识形态的核心定义在政治科学领域多年未变,但其内涵已经历了诸多变化。很明显,把意识形态看成一个信仰体系,同时又将其从负面的内涵中剥离出来,并非易事。CDA 感兴趣的不是文化层面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 van Dijk (1998) 视意识形态为构成“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的“世界观”(worldviews):“是关于社会某些方面的描述和态度图示组合而形成的联合体”,如白种人对黑人的图式构建(van Dijk 1993b)。此外, CDA 研究者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作者总结了目前 CDA 领域所感兴趣的重要研究议程和面临的挑战。有六个主要范畴:1、分析、理解并解释知识经济的冲击;2、把认知学科的方法引入 CDA 分析;3、分析、理解并解释西方政治体系内的新现象。准确地说,是深入研究“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和“参与”(participation)现象;4、分析、理解并解释新媒介和相关题材的冲击,这些导致了多模态理论和方法论的出现;5、分析、理解并解释复杂的历史进程、霸权话语和 CDA 方法之间的关系;6、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法并对过去和目前研究过程及方法进行反思,以避免选择最适合假说的例子。

Wodak 和 Meyer 在该篇文章里分析了 CDA 和 DA 的异同,还介绍了 CDA 的不同研究方法,如社会认知法(Sociocognitive Approach,简称 SCA)、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简称 DHA)等。如 Wodak 所言,某些批评家们会继续认为 CDA 是介于社会研究和政治讨论之间的墙头草,而另一些批评家会指责 CDA 的一些研究太过于语言学化或不够语言学化。然而,正是这种种的批评促进 CDA 研究者进行反思,寻求新问题和新思想。

第二章“福柯式批评话语分析和定因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包含四个部分:引言(Introduction)、话语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discourse theory)、从话语到定因(From discourse to dispositive)、话语和定因分析方法(Methods for analyzing discourses and dispositives)。作者 Siegfried Jäger 和 Florentines Maier 以米歇尔·福柯关于话语以及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见解为摹本,给读者清晰地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及定因分析。话语及其外延和定因分析探究了包含在话语和定因之中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是如何在权力和知识的复杂体系中与权力关系紧密相连的。知识是行动的基础,它不光涵盖了话语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 还包括非话语实践(non-discursive practices)和物质化(materialization),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福柯认为, 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构成了“定因”(dispositive)。然而福柯关于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两者之间的关系界定模糊, Siegfried Jäger 和 Florentine Maier 关于“相互作用”(interplay)这一概念的使用, 既建立在福柯式理念之上, 又超出了他的思想。

第三章“批评性话语研究: 社会认知方法”。Teun A. van Dijk 在“术语和定义”小标题下, 解释了较之 CDA, 他为何更青睐于批评性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以下简称 CDS)这一术语, 因为它不仅是批评性分析, 而且是一种批评性理论, 同样还是一种批评性运用。批评性研究运用了大量的研究方法: 它们有的来自话语研究本身, 有的来自人文学科、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

van Dijk 在该文中着重强调了认知在话语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批评性话语研究是在“话语—认知—社会”三角关系(discourse-cognition-society triangle)的框架中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他注重研究语言使用者心理活动, 尤其是他们在制造话语和理解话语, 参与言语交流, 融入其他社团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以及信仰时的心理。此外, 他也关注: 这些认知现象是如何与话语结构、言语交流、交流事件和形式联系的。为了把上述诸事件去神秘化, van Dijk 引用了一些典型的认知概念: 如心智模型¹(mental models)和语境模型²(context models)。

在“话题: 语义宏观结构”(Topics: semantic macrostructures)小标题下, van Dijk 分析了一个具体的文本: 《关于反对制裁微软的请愿书》(“A Petition Against the Persecution of Microsoft”)。van Dijk 提倡批评性分析应始于语义宏观结构。也就是先研究话语整体意思(global meaning)、话题(topics)或主题(themes)。在话语的整体意思中, 言语者会加入大量的主观信息, 表达事件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 of events)的全部内容。van Dijk 还指出, 批评性分析同样也关注由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s)所控制的现场意义³(local

1 心智模型(mental model): 是用于解释个体为现实世界中某事物所运作的内在认知历程。这是一种外在现实的内部标识或表示方法, 被假设为大部分的认知心理学。简言之, 指人们通过经验、训练和教导, 对自己、他人、环境以及接触到的事物形成的模式。

2 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 是具体的心智模型, 可以从话语语用层面进行理解。由于社会架构, 如组织、团体、种族等都是些现象, 它们无法与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心智过程直接联系起来, 我们就需要一个媒介认知机制, 它既能微观(locally/micro)和宏观地(globally/macro)表征社会机制的相关架构, 又能“控制”话语, 即其产生和理解的心境模型与其情境中的变式(situated variation)。这个媒介认知机制指的就是语境模型。简言之, 指文本基础表征和读者背景知识相互作用下由推理而形成的内容或心理上的微观世界, 它们允许读者对话语进行推理, 并预测可能结果。

3 现场意义或局域意义(local meaning): 相对于整体意义(global meaning)而言, 指的是词汇意义、命题的结构和本质、连贯以及命题之间的关系, 如含意、预设、描述层次和间隔尺寸/粒度程度(degrees of granularity)等。粒度是表现一个物体或活动特征的相对大小、比例、细节等级或穿透深度。

meaning)。在交流情形中并非所有的现场意义都具有同样的适宜性。语境模型的不同种类和内容决定着基于心智模型的事件的意义生成。换言之,语境模型决定着话语是否适宜。然而,一个话语是否连贯而有意义,并不是因其相关性和适宜性,而是因为话语是由语言使用者来诠释的。诠释一个话语意味着要“重塑一个心智模型”,van Dijk 将其定义为“事件模型”¹(Event models)。

由 Martin Reisigl 和 Ruth Wodak 共同撰写的第四章“话语—历史观方法”包含“关键概念和术语的介绍”(Introducing key concepts and terms)、“话语—历史观分析法的分析工具和原则”(Some tools of analysis and principles of DHA)、“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分析”(Approach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s about climate change”)以及“结论”(Conclusions)四个部分。

在“话语—历史观分析法的分析工具和原则”这一节中, Martin Reisigl 和 Ruth Wodak 指出,话语—历史观分析法(DHA)包含三个层面:1、确立具体话语的具体内容和标题;2、研究话语策略;3、检测语言手段²和具体的、依赖语境的语言体现³途径。同时,作者罗列了关于话语—历史分析法(DHA)十条重要原则,值得注意的有:

话语—历史观分析法(DHA)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性包括理论、方法、方法论,研究实践和具体运用;话语—历史观分析法是问题取向(problem-oriented)的;把具体研究与人种学结合起来(研究“内因”),进行全面分析和理论化;研究不同体裁、公共领域以及文本交织和话语交织之间的关系;话语—历史观分析法注重在历史背景下阐释文本和话语。这种历史观分析法可以帮助研究者穿越时空地分析;分类和工具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来详细阐述。

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分析”部分,作者们用一个实例分析,提出了话语—历史观分析法八步骤方法论:

1. 激活并参考以前的理论知识(例如:收集、阅读和讨论以前的研究);
2. 系统收集数据和语境信息(信息采集主要依靠研究问题、不同的话语

1 事件模型(Event model):从话语语义层面进行理解,即产生和理解话语意义的认知方法。换言之,是人们认识、了解、诠释和回忆“现实”的结构主义方法的一个关键的认知层面;它们不仅是话语理解的结果,亦是话语产生的基础;事件模型是“主观的”(个人对事件的诠释),同时它们也有着社会基础,因其例示着社会分享知识和团体的意识形态。

2 语言手段(linguistic means):(如类型 types)又称伴随语言现象,指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语调、各种手势、身势和面部表情等。伴随语言手段仅仅是语言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成为独立的语言,它起着加强语言、表情达意的重要作用。

3 语言体现(linguistic realizations):(如字符 tokens)语言作为体现形式表征人物、物件、现象/事件、过程和行动,进行话语建构,反映了话语者对世界的认识。例如,及物性系统是功能语言学中用来表达人类经验模式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及物性系统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索话语的活动类型,揭示现实世界中事件和人物是如何开展活动的,人物和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话语者的内心发生过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或者说,话语者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表达他们曾经体验过的经验世界的各个过程。

和话语事件和社会领域；同时也关注参与者、符号媒介、体裁和文本）；

3. 为具体的分析选择和准备资料（依据相关标准和录音抄本等来选择和缩小资料数据范围）；

4. 详述研究问题，将研究问题具体化，形成假设；

5. 定性实验研究（可以检测分类和验证初步假设以及进一步详述假设）；

6. 详细案例研究对一整套资料数据进行详细的案件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局部辅之以定量研究；

7. 形成批评（阐释结果，考虑相关背景知识，参阅“批评”的三个层面¹）；

8. 运用经过详细分析的结果。这八个步骤是采用递归的方式进行的。

在结论部分，Martin Reisigl 和 Ruth Wodak 总结出话语历史分析法的优势和其局限性，并指出该领域将会面临的挑战。

第五章“制约与平衡：语料库语言学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贡献”，由 Gerlinde Mautner 撰写，介绍了语料库语言学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作用。语料库方法是采用计算机辅助的“索引程序”软件，对大量真实的文本数据进行分析，虽然在 CDA 领域还不为常用，但极具潜力。

近期大量的 CDA 采用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法（例如：Baker & McEnery 2005; Baker 等 2007; Baker 等 2008; Cotterill 2001; Fairclough 2000a; Mautner 2007; Nelson 2005; Orpin 2005）。即便如此，语料库语言学方法也未能被公认为 CDA 方法论准则的核心。因此可以说，本书（第二版）中增添了由 Gerlinde Mautner 撰写的这一章，标志着这一倾向有所改变。

关于语料库语言学的“贡献”，让我们回顾一下被称之为“主流”CDA 的主要原则之一，即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到话语产生和接收的具体“语境”、历史背景、政治因素等，以挖掘出其社会意义从而进行社会变革工作。社会背景和文本是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却又不是清晰的一对一的方式。因此，语料库语言学对于 CDA 起的是“促进/帮助”作用，而非用语料库语言学“做”CDA（“doing CDA”）。作者同时指出，在 CDA 中使用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研究者用不着摒弃其原来所熟悉的传统的 CDA 研究方法。作为辅助方法，语料库语言学方法非常灵活，运用得恰当将会使研究设计和结果阐释减少个人主观性。正如 Gerlinde Mautner 所言，语料库语言学于批评话语分析，就像一部电影中荣获奥斯卡金奖的配角，这配角也许挽救不了一部差的影片，但是他或她能够为一部好的电影锦上添花。

1 作者的“批评”概念是建立在道德标准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包括民主标准、人权、合理论证/立论的标准三个层面。

Gerlinde Mautner 的这篇文章就是朝着此方向努力的。

之后,在“关键概念和实例阐释”部分,作者给读者介绍了语料库语言学中的语词检索软件(Concordancing software)、语料库设计事宜(Corpus design issues)、语料库类型和数据抓取(Types of corpora and data capture)。

Concordancer 程序本身并不能进行文本分析,它们只是对文本实施操作以便于研究者对其进行分析。Concordancer 提供的某些信息是定量的,如绝对和相对词频。程序还可以计算能在显示词条同时出现的相关统计意义的方式,例如,能测出固定搭配的 *t*-值和能显示两个词之间紧密关系的 MI-值(mutual information),即它能测出两个词同时出现的几率是高还是低(Church and Hanks 1990; Clear 1993:281; Huston 2002:73; McEnery & Wilson 2001:86)。

Mautner 用了一个实例进行分析讲解——“建立一个与形容词 ‘unemployed’ 有搭配关系的词库”。步骤一:选用包含报纸文章的语料库。Wordsbanks Online¹ 是一个主要由英美文本组成的、含五亿多个词的语料库,其中近六千万字的文本主要来自英国日报《泰晤士报》。搜索发现《泰晤士报》语料库包含 567 个与 unemployed 搭配的词条。结果显示出位居 *t*-值榜首的十个词中的虚词 *an, are, who, and, for*, 在 CDA 的研究背景下,对于分析者并无用途。而另外五个实词 *people, term, long, million, workers* 中, *long* 和 *term* 极有可能是形成了 *long-term unemployed* 的搭配关系。与随意选的 *happy, sad* 两个形容词的语料库搜索相比, *t*-值显示跟 unemployed 搭配的实词多,而与 *happy* 搭配的实词没有,与 *sad* 搭配的只有 *very* 一词。词条作为语法概念在同一 *t*-值中的呈现表明它们有构成固定搭配的确定性。指示人的名词词组的“习语化/固定搭配”(phrase-ness),用 CDA 术语来讲,可能指代的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固有的话语建构。从 MI-值结果显示的位居榜首的十个搭配可以看出与 unemployed 一词相联系的一些社会特质: *unemployable, disadvantaged, homeless*。频繁出现的一些名词搭配包含了一些社会标签指向边缘化、依赖性强的、经济不活跃的社会团体: *家庭妇男、家庭主妇、年轻人、领救济金者、索赔者*。如不是单纯为了做演示,在真正的研究中,语料库里出现的这些高频(搭配)词将非常有研究价值。例如,“unemployed youths”,研究者可以通过搜索“unemployed youths”跟什么样的动词搭配频率高来进一步研究失业的年轻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如何比较 *househusband* 和 *housewife* 的用法;还可以研究“unemployed”一词在句法上是如何与含消极意义的形容词进行

¹ 参看 www.collins.co.uk/books.aspx?group=154

高频搭配的;以及量词是如何促进“失业的人”组成一个“问题”团体的。所有的这些问题让我们认识到“检索软件”的另一个特征,除了提供词频和数据之外,它还可以帮助话语分析者做定性分析。

步骤二:语词检索软件可以按照字母顺序搜索在“unemployed”前后与之同时出现的词语。通过这种分类,被搜索词语的搭配环境将很快被鉴定出来,搭配频率高的词语会一目了然。以搜索“unemployed and another adjective”为例,结果显示9个这样的组合中6个都有负面语义意义:desperate, disadvantaged, divorced, homeless 和 unemployable(这个词出现两次)。为了确保这种语义组合并非局限于报纸话语,作者又拿“英国口语语料库”(British Spoken Corpus)对相应的数据进行了搜索。结果得到证实。通过语词检索软件,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出,被检索的“unemployed”一词,具有消极“语义氛围”(semantic aura)或“语义韵律”(semantic prosody)。

作者紧接着指出,对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持批评态度者会争辩:研究者即使不用大的文本数据库和复杂的软件也能证明“失业”并不是件令人愉悦的事。的确如此。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实证研究的公正之处就在于它能为直觉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寻找到证据。其次,某些“显而易见”是在数据出来之后才呈现的。为此,作者给我们举了Stubbs(2001)的例子,中性词“cause”和“provide”,语词检索显示:与“cause”搭配的通常是含不好意义的词语,如“damage”,“death”,“disease”或“trouble”;与“provide”搭配的通常都是“好词”,如“care”,“help”,“money”,“service”(Stubbs 2001)。

第三,语词检索软件可以帮助研究者辨别出被搜索词语的语义倾向和话语韵律(discourse prosody)。语义倾向和话语韵律两者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特定词语会与何种社会事件有关,它通常又表明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第四,很多诸如 Wordsmith 的软件,可以让研究分析者通过比对不同语料库,统计确定哪些词是语料库里的“关键词”(Baker 2006; Baker et al. 2008; Mulderigg 2006)。

总之,语词检索软件的上述特征很适合 CDA 的具体运用,使得 CDA 对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成为可能。研究者可以通过使用“词频列表”、“词表对比”、“t 值”、“互信息值”工具来获得定量语言数据;通过使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索引行”来确认“语义倾向”(semantic preference)和“语义韵律”(semantic prosody)。

在“语料库设计事宜”(Corpus design issues)里, Mautner 指出, 语料库设计必须具备以下四点: 一、可机读; 二、文本要真实; 三、样本性; 四、代表性。很显然, 文本可机读是用语词检索软件分析语言的前提。标准语词检索软件需要“纯文本”(plain text)文件, 即去除格式、版面设计和插图的文本。当然, 印刷样式、颜色、文本形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修饰作用, 这些因素和文本一起构成了话语的社会功能(van Leeuwen 在本卷书中有提及)。语词索引所无法避免的符号删减(Koller & Mautner 2004)不能影响到研究分析, 研究者一定要确保语词索引时“丢失”的这些成分在最后的分析阶段能找回来。文本必须有“样本性”和“代表性”、为的是保证所选的文本也要适用于其他方法的研究(参看 Mautner 2008)。

语料库类别多样、大小不一。通常分两类, 一类为“参考/参照语料库”(Reference Corpora): 如含 1 亿词语的“英国国家语料库”(BNC,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和 5 亿词语的“词语银行在线”(Wordbanks Online)。这类大型语料库有助于 CDA 研究社会问题如何显著地反映在语料库题材和话语中。另一类为“DIY 语料库”。这类语料库是由研究者个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制作而成, 通常是为了进行小范围的研究, 运用诸如 Wordsmith Tools 的语词检索软件。

除此之外, 语料库也可按照其他标准分成共时语料库(反映同一时代语言变化/多样性)和历时语料库(反映语言历史变化); 整体语料库(包含各种题材和媒介)和具体语料库(关注某一特定的题材、某一特定的媒介和话题); 语料库标记(corpus mark-up)和语料库标注(corpus annotation)。

不管建立哪种类型的语料库, 关键是要确保语料库与研究的问题充分适宜, 确保与语料库大小、同一/样本性和代表性相关的事宜协调一致。

如前文所述, 研究者可以选用大型语料库也可以选择以研究者的研究目的为导向而建立的小型语料库。但是, 批评话语分析家能从两者的结合使用中获得更大的收获。研究者自己建立的语料库越小, 就越有必要将其从小语料库中获得的证据拿到大语料库中去证实。换言之, 用参照语料库支持对小语料库数据的阐释(Using a reference corpus to support interpretation)。通过大语料库的比较验证可以肯定或否定先前的怀疑, 从而确保避免“过度诠释/诠释过度”(overinterpretation)或“不足诠释/诠释不足”(underinterpretation)(O' Halloran & Coffin 2004)。作者用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如何进行“比较证据”(comparative evidence)。大型语料库证据通过参照出现在整个话语团体的价值观和态度, 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制约与平衡”。

Mautner 在“总结和批评”(Summary and Critique)部分指出:语料库语言学给 CDA 的帮助诸多。它为 CDA 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文本数据,支撑了 CDA 的实证基础,减少了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性从而提升了分析的可信度。另一方面,语料库语言学被运用到关于权力、不平等、变化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中,“理论和方法论的跨学科的结合”(Baker 等 2008),使得 CDA 和语料库语言学同时受益。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进行 CDA 分析包含四个步骤:一、建立相关电子语料库以研究关注的社会问题;二、使用包含“频率表”、能“辨别关键词”、“解释显著搭配”的语词检索软件进行语料库搜索;三、对索引进行定性分析以建立与所研究的社会问题相关的词语的语义倾向和语义韵律;四、用大型语料库检测研究者从以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小语料库里获得的数据。

如 Mautner 所言,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在 CDA 中的运用也存在一些不足:语料库语言材料中所提供的不连贯的语言片段缺乏语境的整体性,语料库的建立也有可能带上研究者意识形态的偏见。

Theo van Leeuwen 撰写的第六章“话语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语境重置”包括“引言”(Introduction)、“理论背景”(Theoretical background)、“话语和社会实践活动”(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和“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四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Theo van Leeuwen 将“话语”(作者使用了“话语”的复数形式:discourses)定义为“社会建构的方式,用以认识某些必须被描绘的现实。换言之,话语是有具体语境框架的”。作者认为,“话语”(discourse)并非“文本”(text)的近义词。然而话语(discourses)的存在又无法避免地来自于文本。我们可以用一个文本来进行方法论的演示,但它无法给话语的构建提供充分的证据。更准确地讲,话语是有着相似描述的不同文本关于现实的一个指定方面和同一语境的重新构建。在整个章节中,作者就以“领导艺术”(leadership)为话语范例说明,批评性地分析“声音”(voices)¹的各种文本,以揭示它们是如何构建话语“领导艺术”(leadership)的。作者认为,话语不仅是建立在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的,而且是社会实践活动的重塑,它让人们了解为何会发生这些社会活动以及为什么它们是合法的(参看 van Leeuwen 2007)。

正如作者在“理论背景”部分所言,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意识

1 An online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managers and executives, called “Voices”. 一个被称之为“声音”的关于“领导艺术”的网络问卷,用以评定经理和执行官的表现。